

列宁全集

LIENING QUANJI

列 宁 全 集

LIENING QUANJI

第 十 九 卷

1909年6月—1910年10月

人 民 出 版 社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高叔眉、黄有自、韩振华、周忠和、梅锡铭、郭天相、王树春。

参加资料编写工作的有：丁世俊、张瑞亭、王澍、王丽华、刘方清、王锦文、刘彦章。

参加编辑工作的有：杨祝华、许易森、项国兰、江显藩、钱文干、孔令钊、李京州、李桂兰、刘京京。

全卷译文由胡尧之、何宏江审订。

列 宁 全 集

LIENING QUANJI

第 十 九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496,000 字

1989年10月第2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200

ISBN 7-01-000336-X/A·12 定价9.90 元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3. 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4. 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5.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6.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7. 《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前 言

本卷收载列宁 1909 年 6 月至 1910 年 10 月期间的著作，是列宁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所写的几卷著作（第 16—19 卷）中的最后一卷。

自 1907 年六三政变以来，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急剧转变和严重危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斗争日趋激烈。孟什维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取消派。取消派认为，在反动时期，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是不需要的，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重心应该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放在合法机会上。他们放弃革命，宣布不必争取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社会民主党，完全转到各种合法组织中去进行活动，力图使这些组织脱离党、同党对立。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召回派。召回派主张从国家杜马（议会）中召回工人代表，号召党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和工作方式。他们在革命处于低潮、国内不存在直接的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要立即采取冒险的革命行动，而不愿对广大的工人群众进行日常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取消主义代表了半自由主义倾向，召回主义代表了半无政府主义倾向。取消派和召回派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队伍中的两个极端，但它们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取消派直接建议取消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而召回派则在暗中威胁党的存在，导致

党和群众的关系被割断,使党变成宗派组织。无论是取消派还是召回派,都散布不相信劳动人民会起来革命和工人阶级能够取得胜利的思想,都对党起着瓦解作用。列宁认为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所造成的党内危机是无法避免的,只有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消除,因为这种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俄国由农奴制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特殊阶段的产物。列宁也一再说明,这种危机是由革命时期加入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动摇性引起的,取消派和召回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个彼此对立而又相互补充、并且同样具有局限性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代表。为了保存和巩固秘密的社会民主党、扩大党对群众的影响,使群众作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列宁坚持不懈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取消派,又反对召回派,反对它们对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的歪曲。可以看出,列宁阐述这个阶段的党内斗争问题的文献占了本卷的大部分篇幅。

本卷在开头刊载了列宁的一组有关《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献。《无产者报》是由列宁编辑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机关报。1909年6月21—30日(公历)在列宁主持下召开的这次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有地方组织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派别活动进行的。会议的这一主要内容体现在列宁为会议所写的公报、他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和发言、他为会议草拟的多项决议中。会议不仅谴责了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而且采取组织措施,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划清界限。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在揭露召回主义的实质时,把它和取消主义作了比较,称后者为“右的取消主义”,而称

它为“左的取消主义”。列宁同以亚·波格丹诺夫、格·阿列克辛斯基、安·索柯洛夫、阿·卢那察尔斯基、马·利亚多夫等为代表的召回派进行的斗争从1908年春就开始了。列宁指出，在召回派看来，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机会，千方百计进行秘密活动——这就是他们的一切。召回派不了解合法机会对社会民主党、对党的利益有什么意义。列宁认为，利用合法机会对于社会民主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社会民主党并不把这一点看作独立存在的目的，而是处处把它同秘密活动的任务和方法密切联系起来。在斯托雷平反动体制下，不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计划地适当结合起来，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列宁在为阐述扩大编辑部会议的精神而写的《取消取消主义》一文中继续把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联系起来加以批判。列宁说，不坚决取消取消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不能前进，而取消主义不仅包括孟什维克的公开的取消主义，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即召回主义以及最后通牒主义、造神说等。

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以及会议《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专门对最后通牒主义进行了揭露。列宁经常把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作为一个派别提到。列宁认为：要在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之间划出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它们紧紧地系在一起了；它们在政治上毫无区别，只不过最后通牒主义是一种隐蔽的召回主义，所以造成的混乱和涣散就更大。第一、二、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都由孟什维克占多数组成，党团在其活动中犯了严重错误。它企图使自己独立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它拒绝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自行其是。布尔什维克批评并纠正党团的错误，尽力改进党团的工作。而最后

通牒派则不主张用革命精神教育党团，做细致的工作使其克服错误；它主张向党团提出要绝对服从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最后通牒，否则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从杜马中召回。列宁指出，最后通牒主义是不要党对杜马党团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拒绝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议会活动的经验。最后通牒派把他们的做法同布尔什维克过去对布利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抵制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这是对当时进行的抵制的真正含义和性质的歪曲。列宁说，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企图根据在革命的某个时期曾对代表机关进行抵制的个别事实得出结论说，抵制路线是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特点，甚至在反革命得势时期也是如此，这表明，它们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另一面，因为后者鼓吹，凡是代表机关统统都要参加，不管革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不管有无革命高潮。在本卷中，揭露最后通牒主义以及召回主义的文献散见于前前后后，其中，《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一文是专谈最后通牒派的问题的。

列宁在批判取消派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对待国家杜马的不同错误态度时，阐述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进行斗争的问题。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中《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二次讲话和决议草案》指出，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议会不同于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之处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不是象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议员那样把议会活动推崇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独立存在的活动，而是尽力使自己的工作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活动根本不是想替反革命专政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思想、革命决心和各方面的组织性；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还要通过议会斗争积极干预所有劳工法的问题。

列宁在扩大编辑部会议之后所写的《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等文献指出,在反动势力加强的条件下,在社会民主党同群众的联系被破坏、党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掌握议会的斗争武器就成了党的特殊任务。列宁说,这是由于培养群众意识的任务(而不是直接行动的任务)日益被提上了日程,是由于利用旧政权所创造的宣传鼓动的方法(而不是群众对这个旧政权本身的直接冲击)日益被提上了日程。

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也对造神派进行了抨击。造神派是产生于布尔什维克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宗教和哲学流派,它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紧密相连,其代表人物为卢那察尔斯基、弗·巴扎罗夫等人。列宁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见本版第18卷)曾从思想上给这个流派以系统的批判。在本卷中,列宁在论述党内斗争时也多次对这个流派进行批判。本卷中的《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等文指出,在反动时期,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制造宗教,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造神派靠几个资产阶级出版社的帮助,在俄国的合法书刊上大肆宣扬造神说,在客观上起了与资产阶级相呼应的作用。

扩大编辑部会议《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这一决议是就卡普里党校的问题而作的。这所所谓党校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领袖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于1909年春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创建的。这些人以从工人中培养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领导者为名义,把这所党校办成了自己的派别组织中心。列宁说明这所党校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列宁说,党校所追求的不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内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标，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标，布尔什维克派对这所学校不能负任何责任。载入本卷的《可耻的失败》一文专门介绍了该校非法创办的经过。

无产阶级的文学家阿·高尔基一度接近造神派，并参加了卡普里党校的教学工作。本卷所载《资产阶级报界关于高尔基被开除的无稽之谈》一文专为高尔基被开除一事辟谣。列宁说，高尔基通过自己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联系，因此只能以鄙视回敬这些报纸。在《政论家札记》中，列宁揭露波格丹诺夫一伙人为了他们的小集团的利益对高尔基加以利用的行为。列宁说明：高尔基无疑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都可因他加入自己的这一派别而引以自豪。列宁进而指出，高尔基是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波格丹诺夫等人企图利用高尔基来为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撑腰，他们利用的是高尔基对无产阶级所作的巨大贡献中的一个负数。

本卷中的《论“前进”集团(大纲)》、《政论家札记》、《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等文都评述了“前进”集团。前进集团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在卡普里党校解散后于1909年12月由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倡议建立的。该派曾在国外出版同名刊物。“前进”集团在政治上否认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必要性，否认建立新型的秘密党组织(它以合法组织网作外围，并且必定要利用一切合法机会)的必要性；它宣布召回主义“合理”，为召回主义打掩护。“前进”集团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制造和旧文化完全对立的“自己的”文化，首先是创造“自己的”哲学。列宁指出，“前进”集团的所有关

于“无产阶级的文化”的词句，所掩饰的正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列宁说，当时在科学、哲学和艺术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而“前进”集团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家核心就是马赫主义者，在他们看来，非马赫主义的哲学就是“非无产阶级的”哲学。

本卷从一开头的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起就阐述布尔什维克如何与以格·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结成联盟的问题。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反取消主义派。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退出了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为了同取消派作斗争又于1909年重新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他虽然仍持孟什维主义的立场，却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并为此和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在《取消取消主义》、《被揭穿了取消派》、《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党在国外的统一》、《党的统一的障碍之一》等一系列文献中，列宁说明：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始分化出来；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是要理解这种形势，千方百计地处处尽量把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分开，同后者接近。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宣布了护党路线，反对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这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巨大胜利。列宁提出同孟什维克护党派达成协议的基础是：保卫党和党性，反对取消主义，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妥协，决不掩饰策略分歧和其他分歧。

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中指出列·托洛茨基在当时的党内斗争中表现了最恶劣的调和主义精神。托洛茨基自称无派别，实际上是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他的调和主义愈是狡

猾、愈是巧妙、愈是动听地用所谓护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辞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调和派空喊“统一”，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堵住”意见分歧的根源，使对立的派别保持中立。列宁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揭露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使用的手法说，他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比两派都高明。

本卷的许多文献都论证了在党内斗争中保持和巩固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必要性。在《关于巩固党和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知》等文献中，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产生有其很深的根源，采取只消灭两种倾向中的一种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两个派别实际接近的基础，不在于呼吁统一和呼吁消灭派别等等，而在于这两个派别的内在发展。列宁说：党是自愿的联盟，只有当实行统一的人们愿意并且能够抱有一点诚意来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统一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当统一是企图混淆和模糊对这条路线的认识的时候，统一就是不可能的，就会带来危害。列宁又说，党内斗争无论怎样严重，有时又是那样困难，而且总是使人不快，但是，谁要是看不见在党内斗争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的觉悟工人所形成的党的基本核心的团结过程，谁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论统一》、《反党的取消派的〈呼声报〉》，还有上述《政论家札记》、《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知》等文献，都评述了1910年1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著名的“统一”全会。这是一次充满激烈斗争的会议。各个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调和派在会上占多数。在会上列宁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布

尔什维克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得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支持，他们竭力袒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而调和派实际站在他们一边。在这次会议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被选进党的中央机关，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为全会所支持，“前进”集团被承认为党的出版集团；布尔什维克的中央被解散，《无产者报》停刊，而呼声派（取消派）和前进派则只是口头上答应解散他们的派别和停办其派别机关报。

载入本卷的《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情况的》一文评述了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斗争进行歪曲的现象。文中提到，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哥本哈根开幕那一天发表了托洛茨基歪曲介绍俄国党内情况的匿名文章，为此，列宁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提出了抗议。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杂志也发表托洛茨基的文章和马尔托夫的文章，歪曲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列宁又写《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这一长文予以驳斥，但《新时代》杂志的领导人卡·考茨基等拒绝刊登列宁的文章。马尔托夫、托洛茨基的文章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斗争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场“为影响政治上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的根子是在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之中。布尔什维克在1905—1907年的革命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的口号，认为只有这种专政才能够彻底肃清一切封建残余、保证生产力的最迅速发展，而孟什维克却认为这两个阶级的专政“会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相矛盾”。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列宁也批驳了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关于俄国无产阶级落后和不成熟的论

调。列宁说明，马尔托夫、托洛茨基歪曲俄国的党内斗争，从而也歪曲了俄国革命的历史。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以及《为什么而斗争?》、《论俄国罢工统计》、《革命的教训》等文对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进行了总结。长文《论俄国罢工统计》指出，在1905—1907年这三年中，俄国罢工人数的最低数超过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时期曾达到过的最高数；尽管这并不说明俄国工人比西方工人更开展、更强大，但这说明，人类迄今尚不清楚，工业无产阶级在这一领域中能够发挥出何等巨大的力量，而这样巨大的力量却第一次在一个正面临资产阶级革命的落后的国家里显示出来了。列宁说明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是相互依存的。在运动初期和在吸引新的阶层参加运动的时候，纯粹经济罢工起主要的作用，而政治罢工唤醒并推动落后者，把运动提高到更高阶段。《革命的教训》一文总结了革命的三点主要教训：一、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二、仅仅摧毁或限制沙皇政权是不够的，必须把它消灭，不如此，沙皇的让步总是不可靠的；三、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对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并且它们所争取的自由也是各不相同的。

在《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等文章中，列宁揭露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背叛民主事业、倒向专制制度的行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反动时期同沙皇政府结成了密切联盟，俄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所标榜的“民主主义”彻底破产。1909年，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思想家们出版了《路标》文集，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指出这一文集反映了现代立宪民主主义的无可置疑的本质，是自由

派叛变活动的百科全书。《路标》攻击代表俄国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攻击群众的民主运动。它在斥责“知识分子”思想时，既提到民粹主义思想，也提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二者的“拜民主义”都被批驳。列宁说，当时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和仇恨的，与其说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倒不如说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运动，也就是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方面——通过诉诸群众来保卫民主。

列宁在《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和《对芬兰的进攻》两文中指出，受到芬兰人民支持的俄国革命曾迫使沙皇放松对芬兰的控制，使芬兰扩大了民主权利，而当沙皇镇压了俄国 1905—1907 年的革命后，又重新向芬兰人民发动了进攻。列宁指出：芬兰不自由，俄国就不可能自由；芬兰无产阶级的斗争必将用新的团结的纽带把芬兰工人阶级和俄国工人阶级联结起来；芬兰工人只有通过联合俄国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才能免除沙皇的进犯。

载入本卷的列宁《在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关于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分裂问题的发言》和《社会党国际局第十一次常会》一文都涉及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斗争。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指责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制造分裂，它拒绝荷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党加入国际的请求。列宁指出，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显然支持机会主义者，它所进行的要恢复荷兰党的统一的调停完全失败了。

列宁是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的成员。列宁所拟《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和他所写《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载入了本卷。这两篇文献涉及国际合作社运动的重大问题。在这两篇文献中，列宁说明了工人合作社的性质及其在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的合作社通过减少中间剥削、通过影响供货人那里的劳动条件和改善职员的生活状况等使工人阶级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列宁认为工人合作社在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具有愈来愈大的作用，它可以训练工人群众独立管理事务和组织消费，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列宁同时也指出，只要还没有对掌握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阶级实行剥夺，合作社所争得的一些改善就极为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合作社是纯粹商业性的机构，并且要承受竞争的压力，因此有蜕变为资产阶级股份公司的趋势；它不是同资本直接作斗争的组织，有可能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有一些社会党人夸大合作社的作用，把合作社标榜为“社会改革”的“必要”因素。他们对无产阶级合作社和小业主合作社（农业的）不加区别，鼓吹合作社中立，大谈其合作社对社会党承担义务的危害。列宁认为这些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唱一个调子。

载入本卷的《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列宁的一篇长文的某些部分。列宁根据1907年德国的农业统计资料来研究德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在长文的残存部分中对德国农民的状况作了分析。以图式表示，德国当时的农户呈“金字塔”状，底层是几乎占农户总数五分之三的无产者农户，顶端是占农户总数二十分之一的资本主义农户。只是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农户所占有的土地却超过全部土地和耕地的一半，占有五分之一的从事农业的工人和一半以上的雇佣工人。德国当时的无产者农户体现了农奴制的社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的血缘关系，是农奴制在资本主义下的直接残余。大批的无产者农户占有数量微乎其微的